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二期 ——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6f)

| | |
|---------------------------------------|-----|
| 【史海钩沉】庐山会议余波 (二) | 董保存 |
| 【读史札记】“林彪集团”辨析—— 读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后的思索 | 仲 岩 |
| 【文革探微】1970年庐山会议与汪东兴 | 舒 云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庐山会议余波 (二)

• 董保存 •

江青自然成了会议的主角，她又示意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继续发言。

张正光没有讲几句，江青又插话了：“同志们，我还想打断他的话，再提供一些我记录的材料，供同志们参考！不知有没有机会……”

“还有些材料提供同志们参考，时间记不清了。八条是怎样来的？就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林副主席说要到中央文革讨论一下，到中央文革，陈伯达坐到了后面。徐向前这位老帅站起来拿着几条就走，说要去主席批准，我说我们还没讨论，给追了回来。”

“六七年七月，主席出巡大江南北，七、八、九三个月，这些反革命他们就想在那个时候夺权，全部夺权。有什么为证？首先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北图事件，午门会议。午门会议就是布置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的围困中南海，开始在西门，就出不去了，我就告诉总理说，不行了，北门走不了啦，然后又到新华门，那里挂了旗帜，也出不去。我们的意思是叫他们撤

退。最后走东华门，那里也挂了三面旗帜。我给总理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我们上了大当，他们都安排好了，有一个人，这个人我看不惯他，眼珠子上下转的，是轻工学院的，给总理讲，提出要在天安门开十万人大会，在中南海里面斗刘少奇，总理答应了，我们也都同意了，给中南海拉了线。他们要斗刘少奇那个‘黑修养’，目的是搞臭康老，因工作关系，那个‘黑修养’，康老搞不出来，是陈伯达搞的。他们就是要搞康老，搞总理，过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大当。”

“以后主席到武汉，好人都蒙在鼓里，说陈再道要杀害主席。我们着急得很，这个也上当了。林副主席也上当了，也开了天安门百万人大会，声讨陈再道。实际是王力回来把主席的指示给扣了起来，给贪污了，我们不知道。……这次庐山会议，他（陈伯达）被揪出来后，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了。他们军队的后台是杨、余、傅，想把几个大军区都搞掉，想把紧跟主席、林副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一网打尽，换上他们的人。……那时南京已经平静了，就是主席已经到了上海，他们要开几十万人大会，要揪许世友同志，许世友同志已经退到了大别山。”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补充说：“当时要揪许世友同志，反二十七军，姚文元打电话说，这个会不能开。”

江青接着说：“我们得到一份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一箭双雕，危害主席，捉许世友，我打电话制止也不行。深夜了，我去大会堂请示总理，派一架高速飞机叫姚文元到上海报告主席。结果给了一架小飞机，差一点把姚文元给触电死了。”江青看着大家一脸困惑，解释说：“因为飞机小，飞不高，碰上雷电，差一点把姚文元触电死了。”

“姚文元向主席汇报了，主席就请张春桥乘了直升飞机把许世友同志接到上海。他（指许世友）自己还在那里不自觉！他是同情我的。还有你，”江青突然用手指向坐在附近的黄永胜，“也不自觉吧？！”

黄永胜被她一指，显得有些慌乱，不知该不该接茬。

江青仍自顾自地接着说下去：“金敬迈开会整你。就是说凡是跟主席、林副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要一网打尽，这样来适应反革命的需要。这是他们的反革命战略。这一战略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击溃了。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还有抢档案，抢中央首长的医疗档案，我顶不住了，就请总理，我们俩一块顶，还是被他们抢了一些。这些他们都是合伙的。他们称赞杨成武，称赞傅崇碧、余立金。你，也是被称赞的，”江青指着郑维山，“郑维山你应该讲讲内幕他们就不捉你。杨得志也是很不好过，傅崇碧这个王八蛋也是这样。你们想想看。他们是有计划地夺军权，有计划地夺党权，庐山会议就是夺党权，你是夺军权的！”

江青的头随着说话的节奏微微点着，整齐的短发也随着晃动，有几分恶狠狠的样子。

◇ “这些我都不知道！”——郑维山反击

郑维山脸色铁青，看得出这位生平不惧水火的虎将已经气愤之极了。但是，江青的这些话都是上纲上线的大话，郑维山要想反驳她也无从开口。她得意地接下去讲：“阶级斗争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你们背后搞阴谋，那么也奉陪到底！”又提“奉陪到底”——江青的“箭”再次射向了李雪峰。

参加会议的人们有些跟不上江青跳跃的思路，但对于她的意思，大家都听得很清楚——郑维山、李雪峰等是跟随陈伯达反党的。

在一定程度上，江青影响了大会。

江青接着说：“……他们要抓许世友，就是主席在上海。抄了许世友同志的家，抄了陈锡联的家，别人的家都抄了，唯独没抄你郑维山的家，这证明你是知道内幕的。”江青又转向黄永胜，“我不知道抄了你的家没有？”

黄永胜铁青着脸回答：“没有。”

江青知道，黄永胜也没有被抄家，她是故意这样问，在毛主席那里闻到风声的江青，此时，就是要敲一下黄永胜。

江青暗自得意，不再理黄永胜，提高了嗓门对着众人说：“都是‘三团两队’，‘天派地派’带头搞的，大后台是陈伯达，杨、余、傅他们。毛主席告诉我叫杨成武看看林副主席，他都不去。你们知道不知道，丑化人民解放军，搞黄色的东西，天安门、三座门贴得到处都是，故意丑化解放军！”

江青的思路很跳跃，这时又转回到了陈伯达：“陈伯达，我只举一个小例子，就知道是什么人……”

“天才理论家是陈伯达创造的，大树特树也是他创造的，我跟杨成武（原军委办事组负责人、代总参谋长）斗了三次，杨成武给我立了专案，戚本禹也给我立了专案。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清算一下了。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他们想大夺权，在全国大夺权，先搞乱军队，然后危害主席。你们是有一套计划的，你们应该交代。”

江青意犹未尽，又说：“为什么各大军区都捉，就不捉你郑维山，这不是怪事吗？起码你是深知内幕的人。噢！还有一件事，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全国解放后各战略区的部队都有减缩，为什么唯独你华北的部队没有缩减？！”

这些事情都是由中央或军委部署的，根本不是郑维山、聂荣臻或者杨成武能说了算的，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释清楚的。

“你就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有一件事，四八年主席由延安到华北，住在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的阜平县城南庄，结果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否张瑞华告的密？如果你的心还有一点向着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一点心交出来，把好心拿出来，把坏心去掉。”

江青又转向李雪峰：“李雪峰，你是个摇鹅毛扇子的，到现在还奉陪到底。我今天很累了，我是特意来奉陪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反革命战略，他们一层层班子，一套套班子。”

众人以为江青的讲话要结束了，谁知，只听一声“对了”，已经“很累了”的江青又来了精神：“还有一个‘七分钟的闪电’，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题外的就不讲了。是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提供的汽车，提供的大衣、手电。”

王曼恬又适时地补充说：“发枪是那一年。”

事实是，当时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通过戚本禹、谢富治向在首都工作组工作的杨成武、郑维山提出借用汽车和军棉大衣，杨、郑以“部队动一兵一卒和军事装备都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为由没有办，与所谓“七分钟闪电”没有任何关系。

此时的江青已经将她神经质的想象力暴露无遗，她自信可以将很多事情与郑维山联系到一起：“六七年七、八、九大夺权，还有二月兵变、北图事件、午门会议、火烧英代办，你也是深知内情的，应该交代！”

郑维山终于爆发了，大吼：“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相信主席和中央是会审查清楚的。”

××军政委站起来质问：“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你怎么不知道？！”

郑维山说：“谁能证明我知道？！”

××军政委哑然。

江青见有了斗争气氛，讲话的兴致更高：“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就怕张祥久，我说非下了他的枪抓起来不可。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女儿就在东北，是‘五一六’穿了军装，原来是不是躲在你们海军大院？我不相信你郑维山还有那么点心，就算几分之几的心吧，你是最知内幕的。”

“李雪峰你就恭恭敬敬陪着那么一个人，你跟那么一个人走。据说天才两个字，英文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神，神就是鬼，一种就是人。我对英文不懂，听人家说的。这一炮不一定打中。”

江青长出一口气，向椅背靠去。江青这时表示：“我讲完了，不对的请批评，我改正。对的，大家要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军政委对着郑维山，说道：“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

××军军长也站起来，手扶着桌子，盯着自己的上级：“郑维山一贯不老实的，一贯说假话的，现在该说真话了！”

看郑维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省军区司令×××斥责：“节节抗拒，反抗到底！”

北京军区×副政委也质问道：“坏蛋为什么都来找你，你要交心！”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说：“你有什么要老实交代什么！”

郑维山皱着眉头，还是一言不发。他觉得在这样的气氛下，说什么都没有用，与其说了没有用，还不如什么都不说。

这时，江青仿佛又想起了什么，向着众人：“我打断你一句话，一会儿你还讲。我刚才讲话是专门请人录了音的，如果你们要，可以复制给你们一份，但要请示总理批准，政治局讨论。”

此时，黄永胜帮江青说：“原来在北京也这样不安全。”

江青接过来：“幸亏我有斗志，否则就完了。杨成武出事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我问是谁，就把电话放了，后来我的秘书告诉我，你不放下可以查。还有一个凶得很的女的给我打电话，在北京那样不安全，又打电话，又爬墙，不安全就是了。李雪峰六六年讲要给我奉陪到底，我只要不死也奉陪到底！郑维山你要开枪权、扫荡权，这回该我了！”

◇ 咄咄逼人——黄永胜落井下石

对于江青耿耿于怀的“奉陪到底”几个字，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书记、政委，华北局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革委会主任）解释：“当时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不通。”

谁知，江青越发咄咄逼人：“现在应该通了吧！你恭恭敬敬地陪着陈伯达，你在河北干了些什么事？你把黄永胜的名字画掉那么多次。《河北日报》是你管的吧？在北大你想不通，现在你还是这样，一点不觉悟，你为什么还煽风点火？”

李雪峰明白江青指的是庐山会议上的“六号简报”，申明说：“在庐山是陈伯达突然来的，简报是我签的名，什么时候发的我就知道了。”

江青挺直身子，拍着桌子上的几张纸，吼着：“你抢先出简报嘛！”

李雪峰申辩说：“当时规定简报要快，晚上讨论，汪东兴同志去了，简报另外发的。”

“汪东兴同志为你的简报都气坏了，每天到三点他还陪着主席，你们签发的嘛！你们抢先出简报！”江青说。

明明简报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管，负责人是汪东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简报会提前出炉，但是，江青硬把责任推到了李雪峰身上。

江青仍在追问：“简报最早发出，这怎么解释？”

黄永胜仿佛与庐山会议没有一点干系，是个局外人一般，也叫：“大事？每期简报都是大事！”

江青瞥了一眼黄永胜，阴阳怪气地说：“这个没有录音，还有个绝招，简报是记录稿，还有个原稿，是陈伯达亲自改的。”

事实上，陈伯达改的是他的发言记录稿，并非简报稿。

“那天我和康老正在开会，总理派人送来了陈伯达的发言稿，不是记录稿，我们与陈伯达干了一仗，说他真狠毒啊，你想把毛主席周围的人一网打尽。从此再没见过这王八蛋。我当时讲，你拿了枪杀我的头好了，你们就是跟这样狠毒的人走啊！你们怎么解释呢？真狠毒！就是要颠覆我们国家，帮助苏修，颠覆世界革命根据地，这能容忍啊！”

“陈伯达如果当了副主席，你们不就是大臣了嘛！陈伯达不是要当副主席，其实要做主席，说穿了就是这个事。这样你们不就可以升官了！”

就在这个会上，有人喊：“‘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写的，他一直跟着李雪峰，这中间有什么鬼，他应该知道。”

“你们说的那个黄道霞来了吗？”江青仿佛猎人发现了猎物一般警觉地问。

“来了。”不知是谁应了一声。

“那好，叫黄道霞来。”江青说。

可是，会场里哪有黄道霞的影子？在场的人都傻了。

江青尖声质问：“没来？！怎么没来？”

“他回石家庄了。”河北省革委会的负责人刘子厚低声答道。

江青急了，大发脾气：“他干什么去了？谁让去的？我已经知道，为什么逼他走？”

事实上，到会后，听说华北会议要追查陈伯达在石家庄的讲话，在华北地区的所为，李雪峰犯了难：他知道，只要有一句话与事实有出入，别人就会觉得你交代问题不老实，在编造。

然而，他来北京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要带陈伯达在石家庄讲话的记录呢？李雪峰以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问题，没有意识到对他牵扯那样重，没有带别的材料。因此，当会议追查到“六号简报”问题时，黄道霞提出来，要回石家庄取材料。那时，李雪峰没同意。后来，上面指名要黄道霞发言。李雪峰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点头，并且要求黄道霞当晚赶回来。

谁知，上午，黄道霞刚走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江青阴阳怪气地指着李雪峰：“这个你要交代哟？！”

黄永胜落井下石：“昨天开会通知要你的秘书揭发问题，你把秘书派走了，就很恶劣嘛！把罪证烧掉就坏了！”

“我们已经派了两个车去追了。”陈先瑞报告。

“这里边有鬼！”有人随声附和。

“李雪峰同志，我现在还是叫你同志，你如果受委屈了，也要有政治家的风度，你的秘书干这么多的坏事，还叫他走了，我要是处在你这种情况，我就把秘书交给组织，交给党审查！”江青居高临下地说。。

“总理批准叫你的秘书今天下午参加会，结果走了。”纪登奎说。

“陈伯达也跟你一样，那个王保春，下了几次命令才找回来，你这个做法与陈伯达一样，你要把秘书赶快交出来！”江青善于联想。

李雪峰辩解道：“我这里材料少，叫他取材料。”

黄永胜咄咄逼人：“你为什么不问一问？！”

李雪峰并不清楚，他的秘书此时去取材料和之前去取的本质不同，还是李德生点醒了他：“不少同志提到，你的秘书要参加会，揭发你的问题，总理今天下午批准，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把他放走了。”

江青声色俱厉：“到哪去了，赶快交代！”

“你告诉我河北省警卫部队是哪个部队，负责人是谁？叫把秘书抓起来。”

江青抬起头环视会场：“哪个叫马辉？”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站起来，立正回答：“我在。”

江青严肃地盯着马辉：“现在我才知道你叫马辉，你要负责把人抓回来！人要活着回来，死了我找你！”

黄永胜强调：“一、人要抓回来；二、材料一份不能烧！”

马辉大声答道：“是！”

这时，在河北省革委会“支左”的炮五师政委××问：“现在是不是把秘书、警卫员都抓起来？”

江青没有接这个茬，她现在的心思全在对李雪峰的揭批上，也无暇理会这句话：“出了新闻了，你采取什么态度？我觉得李雪峰太不老实了！”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可以要驻石家庄的二十七军负责把李雪峰的秘书抓回来。”

“不！”江青断然否定，“主要由马辉负责，他的秘书要死了，他的材料要烧了，你要负责，向党负责，要活的，要能说话！”

黄永胜不知出于什么样目的，说了一句：“还是不要这么紧张，要做工作动员他回来。”

江青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态度有些过于夸张，解释道：“我就是想建议同志们，不一定全面完整。我想把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七〇年，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同志们，请同志们琢磨一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斗争，要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我看斗争十分激烈，也许我这个纲上高了，上高了就降下来，刚才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人走了还不知道，而且还拿走了材料。”

1月4日清晨，回河北取材料的李雪峰秘书黄道霞被迫了回来。

◇ 不同声音——周恩来的态度。

在华北会议上，在最高领导层，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尽管这种声音不是很强，但它的存在，也对这次华北会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就在江青对郑维山、李雪峰的问题上纲上线，给他们两个人扣上“三顶帽子”，把他们和陈伯达搞成一个反党集团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1月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现在华北会议已进入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需注意加强领导，减少对立，以利团结。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明确提出：对郑维山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不合主席‘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的要求”。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就开好华北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问题发表讲话，并要求予以落实。当晚，军委办事组连夜开会，研究落实的具体办法。为了组织印发江青的两次讲话，周恩来报给了毛泽东。

1月6日，周恩来先后向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华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意见，就落实毛泽东的意见，扩大华北会议范围作出安排。会议要求，郑维山、李雪峰不出席常委会，自行检查。

1月7日，通知郑维山、李雪峰写一个像样的检查。

1月9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召开，与会的143位军队高层领导自本日起参加了华北会议。1月9日至11日，在军委座谈会上，郑维山、李雪峰又作检查。

华北会议上，虽有江青煽风点火，仍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所以，会议要求继续深挖下去。

也许，江青并不明白毛泽东继续开华北会议的真正目的，她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华北会议上做了“表演”，向无意中得罪过她的郑维山、李雪峰泄私愤。

对江青在华北会议期间的两次讲话，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没有采取认同和支持的态度。

1月9日，周恩来致信江青，说：对这两次录音讲话的整理稿“我勾掉的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对讲话中随意点名批评的情况，周恩来指出：“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

同时，周恩来告诉江青，主席6日批示：“讲话不要印发。”7日批示：“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再定。”周恩来向江青建议，将这两次讲话的文件稿先呈主席审阅。

毛泽东审阅后批示：“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做内部材料保存。”

对于这个会的无限上纲，周恩来内心是反对的，但是，他不像郑维山和李雪峰那样，会冲动地顶撞“第一夫人”。

从华北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努力地保郑维山。

有一天，中会散后，周恩来走到郑维山身边，悄声说：“作检讨，不要自己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

郑维山点点头。

1月5日晚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周恩来语气平和地说：“主席、林副主席一直关心这个会，常问起来。李雪峰、郑维山同志发言简报3日送主席，我们4日向主席汇报。”

他望着江青、黄永胜、李作鹏等人说：“第一，我们的意见与你们有相同的，有不同的。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会已经是高潮，你们认为未揭盖子。我们报两种意见，一种李、郑与陈一起打倒，军区改组；另一种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要检讨……”

江青很有些不服气地瞥了周恩来一眼，在他面前，江青还是有三分敬畏。

“说盖子未揭开，任何实质性问题未揭盖，也说得不对，如磁县开枪，就承认了嘛！”

事实上，郑维山意识到，江青一再追查由总理根据中央的决定具体指挥解决磁县铁路问题，是要抓总理的把柄，于是，把责任承担了下来。

“你们一言堂。”江青觉出周恩来在批评自己，眼睛望向别处。

“原想找郑、李谈，后加上解学恭、吴德、郑三生、先瑞、子厚。之后有主席批示，按主席批示办，全国团结起来，与陈伯达划清界线，肃清流毒。个别犯错的沉痛检讨，要深入地整风，要彻底。”

“第二，先不定性。”周恩来望着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严肃起来，“你们四人写陈、郑、李集团，做绝了，那他们就只有听候审查了。当然，即便是方向路线错误，李、郑也要沉痛认识。”

“不要打横炮，省与省，军与军，一股绳有力量。”

江青的特点是见官大一级，总理的话，她也要插嘴，反驳道：“山头主义聂、霸道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了道！”

周恩来息事宁人地说：“三十八军的气，差不多了，打横炮就不好了……”

江青还不死心，指着郑维山，大骂：“你把党的传统丢了，你以为自我批评了，倒霉了！一批你就顶！”

“有点自我批评就欢迎。各种材料你们要核实，也不要都连起来。抓住大的，丢掉小的……”周恩来还是在保护郑维山。

“李总想把简报赖到老汪（东兴）那里去。简报把尖端的话集中了。李雪峰有胆子，就是点火对康老，很清楚了。煽风点火，嫁祸于人，八字由头！”江青还是一贯的态度。

“抓大的，小了就繁琐。人家提出你承认就好，不要一会儿翘尾巴，一会儿没有事。”

“郑为什么跟陈、跟聂、跟杨、跟张国焘？作风不正要抓住。”周恩来似乎在告诫郑维山，也在提醒江青。

郑维山不是坏人，他的错误也就是路线错误，对于这一点，周恩来心中最有数。他也陆续说了下面一些话：

“郑不要失去信心，又不要放下去，水平低，抓不住要害。”“主席的印象是听不清楚。”“陈伯达总有私话，好好挖一挖。”

◇ 看了“六大罪状”——毛泽东越发感到不清楚了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感到要抓军队。

有人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有好几个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会“突然袭击”，没有想到与会的那么多代表上了林彪等人的当，要求设“国家主席”。

——到底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还是那些人起哄？是预先策划好的一场阴谋，还是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

在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中，军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副统帅林彪。当时，对庐山上的事情，毛泽东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在会上批了陈伯达，没有动林彪。但这不等于毛泽东没有对林彪产生怀疑。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削弱林彪的势力，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对军队进行整顿。后来的事实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南巡时，在杭州同南萍等人谈话时说：“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因此，深居南海的毛泽东开始关注华北会议的一举一动，实际上是关注军队的动向。他不清楚北京军区的领导人，特别是郑维山到底和陈伯达是怎样的关系，和林彪又是怎样的关系。

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上报的《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这是两份揭发者根据需要拼凑而成的材料。在揭发郑维山的材料中，列举了他的六大罪状：

（一）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活动。

七〇年六七月间，反党分子陈伯达到华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郑维山同志是陈伯达这次华北之行的召集人。陈伯达到天津后，打电话要郑维山去，当时郑准备给林副主席汇报，林副主席处叫郑等几天……经过请示，黄永胜同志不同意去，没有去。后来，陈又从太原打电话，郑说“事不过三”，就于七月九日迫不及待地赶到大同去迎接陈伯达，准备去内蒙……

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郑维山于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到李雪峰住地，同李谈了一个多小时。据透露，郑在谈话中要李到北京、到军区工作。在全体会上，陈伯达选择华北做反党阵地，搞突然袭击，郑维山积极呼应。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郑维山、李雪峰在庐山上就商量好，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传达，分片进行，不集中学习和传达。郑还说，要防止有坏人利用陈伯达问题，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郑维山主持的北京地区的传达，只讲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几张画皮、几大谎言，没有传达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的内容，没有组织讨论和揭发批判。黄永胜同志看了军区党委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报告后，指出这个报告很不像样子，要重写，要表态，要揭发，要批判。军区才在九月二十日召集军区司、政、后各部领导同志开了半天会应付了一下，根本没有揭发问题。

与会同志指出，郑维山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如紧跟罗瑞卿搞大比武……紧跟杨成武，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这次，又紧跟陈伯达，错误十分严重。许多同志说，北京军区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五保卫”任务，像郑维山这样的领导，将把部队领到哪里去，我们很不放心。

（二）伙同陈伯达压制三十八军、破坏保定文化大革命。

（三）伙同陈伯达在天津包庇坏人。

六七年五月底，天津市王亢之（原天津市委副书记、叛徒、日特）、方纪（原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胡风分子、周扬死党）、李树夫（原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伯达心腹）等为逃避群众的批判和斗争，窜来北京。六月四日，陈伯达通过李雪峰让郑维山同志替他们安排住处，保护起来。五日凌晨，郑即派人将王、方、李接往军区高干招待所，提供吃、住、通讯等一切便利条件，住了四十多天。

六月二十四日，郑维山和陈伯达在陈的办公室，与王、方、李等人密谈四个多小时。六月二十六日，陈又单独把郑找去布置说：“叫他们（王亢之等）先别站出来，避免嫌疑。”六月二十八日，郑又要这三个坏人把陈伯达二十四、二十六日的两次谈话内容，向李雪峰、解学恭等同志作了传达、布置，帮助这些坏人钻进天津市革委会。

六七年九月，李树夫被天津市革命群众揪斗，陈伯达叫秘书给郑维山打电话，说：“陈伯达讲李树夫是他派去的，根本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郑维山立即把这个黑指示通知了天津支左联络站。群众组织便把李树夫放了。

（四）耍两面派，说假话，向中央谎报情况。

（五）关于武装群众问题。

六八年二月，河北省磁县两派群众武斗，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向部队布置说：“如有坏人抵抗，可以开枪，还击只能起威胁作用，一个点只能打死二三人，不能多了。”结果部队开了枪，消耗子弹一万多发，群众亡几十人，伤者很多，至今还扣押着五十七人。

六八年春，晋东南地区连续发生武斗。郑维山在中央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受到江青同志的严厉批评……

（六）严重的军阀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郑维山一贯排斥异己，用恶劣的手法，扩张自己的山头……

杨、余、傅反党问题揭开后，郑因追随杨成武搞“多中心”，受过批评，作过检讨。后来，

他又搞“以郑维山为首的北京军区党委”。去年七月，又对反党分子陈伯达喊“以郑维山同志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表示默认，他旧病复发，明知故犯。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越发感到看不清楚了。报告虽然说了很多问题，但没有看到郑维山和林彪相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和黄、吴、李、邱的瓜葛。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毛泽东要把问题搞清楚的决心，也使他进一步看到了抓军队、整顿军队的重要性。

◇ 对于林彪——毛泽东还在观察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了一份济南军区《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这是份什么样的文件，让毛泽东认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又指示党政军一起学习呢？

原来，这份报告介绍了济南军区在灵魂深处挖掘骄傲自满根子的办法。他们讲，在贯彻毛主席指示时，抓了三个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对这份文件的批示，应该说也是毛泽东抓军队的一个举措。

无论“一贯正确论”、“领导高明论”还是“骄傲有资本论”，都说明军队，特别是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在批这份报告的同时，还关注着军委座谈会的召开。根据他的意见，1月9日，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位军队高层领导也到京西宾馆参加华北会议。

因此，毛泽东有时也将这次华北会议统称为军委座谈会。

现在看来，无论是批三十八军报告，还是开华北会议；无论是批转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是召开军委座谈会，都是毛泽东抓军队的步骤。

事实上，毛泽东还在观察军委办事组，还在观察副统帅林彪。

然而，在军委座谈会上，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既不批陈，也不作

检查，这是为什么？

在毛泽东看来，这可能和林彪有关系。

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送的《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批示中，直接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对于林彪，毛泽东还在观察。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华北会议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林彪住处，向这位副统帅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事实上，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在北戴河，林彪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黄永胜一行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面带怒色，指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毛泽东的确是在看事态的发展，是在看林彪的表现。如果说华北会议时，他就已经看清了林彪的真面目，那不是事实。

◇ “三点不同”——周恩来提出自己的观点

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会议问题，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了；今后两天内，拟续开小组会，再听取大家意见，但也要注意自我教育的整风作用。最后，需有人代表中央作会议的总结讲话。就在这个会上，还研究了关于华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调整安排的设想。

1月2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提出：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也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所谓“反党集团”。华北会议之后，“仍需进行一段艰苦教育工作，如北京军区、华北局旧机构、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军区、天津市革委。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关系，连山西、内蒙在内，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因此，中央的发言和会议的传达，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骤地进行。”

毛泽东阅批：“照办。”

1月20日至22日，周恩来审改了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起草的《在华北会议的讲话提纲》，并于22日将此稿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批示：“大体可用。”

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谈话，商定《在华北会议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提纲再作修改后，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月23日凌晨，周恩来约上李先念，安排与郑维山、李雪峰谈话。因为，23日下午就要召开给华北会议最后定性的政治局会议了，对此，他不无忧虑。

郑维山早已等候在会议室，偌大的会议室只有他一个人。不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

郑维山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总理，我不再作检查。”

“为什么？”

“因为情况明了，性质定了，决心下了，我等待审查。”

周恩来明白，郑维山的意思是说江青他们已把华北问题定性成敌我矛盾，下定决心要拿掉他了。

周恩来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问郑维山的身体情况：“身体还行吧？”

郑维山说，多年的失眠症更严重了，每天都睡不着。

周恩来望着一脸倦容的郑维山，说：“主席叫你们好好想想，睡不着觉是好事，军区、省市总会有意见，要好好地学习，痛一下有好处。比如王诤、曾希圣、陈毅，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至于参加他们的会，可以不参加。23日文件要整一下，要秘书帮助一下，挖深一些，明天大会讲还可以帮。”

“……内因为主，秘书还可以帮。……有人帮助，好好想想，不要推。多找一些引起对自己意见多的，华北局还有人。”

1月23日，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场，会议开始。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江青、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先后发言。

这时，只有周恩来没有表态，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周恩来。周恩来缓缓地，但坚定地讲道：“我的意见与你们讲的有三点不同：第一，你们认为华北问题还没有揭盖子，我认为是到了高潮。我不同意华北会议还没开完即刻改组北京军区。第二，你们硬把郑维山向陈伯达一边拉，这个不好。这样把郑维山向陈伯达那个方向拉，郑维山就可以不作检查只等审查。第三，处理结果向主席报告要写两个意见，一是郑维山作检查继续工作；二是北京军区改组，郑维山免职。把这两种意见报告主席，主席批哪一种意见就按哪一种意见执行。不要只报一种。”

◇ 中央决定——北京军区大改组

1月24日晚上9点，京西宾馆大礼堂里坐满了参加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的人员。

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被指定代表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江青、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和军委办事组的其他成员也相继就座。

周恩来的总结，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等人起草，经政治局开会讨论后，报了毛泽东，再经过修改而成的。最终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这个讲话提纲在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以后，主要讲了郑维山、李雪峰的问题：

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的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对这个稿子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在念稿子的同时还讲了如下的一些话。

“……郑维山是一个红小鬼，14岁参加红军，一直是在前方打仗，是有战功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郑维山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复杂的工作，要是没有责任心，没有党性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完成大量复杂工作任务。”

“郑维山为内蒙人民是做了好事的，解决内蒙问题是有功的。两次解放内蒙问题，主要是第二次对内蒙的军管。”

周恩来讲了3个小时。

就在这个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

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从此，郑维山被免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

对于这样的决定，在郑维山看来，已是预料之中的。但他还是有些不能接受。他感到窝囊，他不服，认为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

开完会，已是晚上12点钟。郑维山往外走时，已经十分虚弱，在上楼梯时，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警卫员小李把他搀回了房间。

保卫部部长徐桐钢奉命去做郑维山的保卫工作，防止郑维山自杀。徐桐钢找到郑维山的秘书和警卫员，要收回郑维山的安眠药。

郑维山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说完，他脱了衣服，到卫生间洗澡去了。

几天后，中央下发了《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郑维山在下面的一段话旁边画上了重重的横线。

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这让郑维山不由得想起周恩来的几次讲话。

周恩来还是要郑维山作检查的，作检查就是没有把他的问题当成敌我矛盾。

然而，郑维山不知道的是各地对会议结论的传达，却忽略了周恩来的声音。天津的王曼恬和河北组的一些人，在小组传达时竟然把江青编造的“郑维山、李雪峰有历史问题”的谎言，都作了传达。

实际上，华北会议对北京军区作了全面的否定——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从现实到历史。

华北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的批陈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军区机关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部被集中到了招待所，开始揭批运动。

~~~~~

## 【读史札记】

### “林彪集团”辨析 ——读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后的思索

• 仲 岩 •

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以八百多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期间，以不同身份从不同角度观察了事件的不同片段的一百多位目击者和知情人的回忆和证词，为破解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这一最大谜团，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拓展了研究的路径。该书的文笔也很洗练、生动，事件本身的情节又环环相扣，因而读来毫无生涩、枯燥之感。这些都无须笔者多说，读者只要自己翻开一阅，便会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笔者此时想说的是由阅读该书而思索的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对庐山会议应当怎么看？

庐山会议是林彪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林彪事件的起因。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在宪法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和所谓的“天才问题”。一方认为应当设，一方认为不能设。一方认为可以称“天才”，一方认为不能称“天才”。这样的问题在具有真正民主气氛的环境下，实在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基本上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认识性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讨论来解决的，讨论不成，可以求同存异，或通过表决来解决。表决前毛泽东可就自己的观点当众做出解释，只要言之成理，别人也不至于硬不尊重，何至于要把这样的问题上纲为反革命政变呢？难道在中央的会议上就不允许发表不同的



意见？既然不允许，就下一纸公文好了，又何必开会呢？从陈伯达、李雪峰、汪东兴、吴法宪这些被要求做检查的人的陈述来看，他们都对自己的“错误”不甚理解，不知道应该检查些什么，他们的检查也总是过不了关，只有汪东兴是个例外，但他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良动机。其他几位，则始终是一头雾水，个个对自己的厄运感到莫名其妙。这恰恰证明，他们只不过是兴之所至地发过几句言罢了，尽管会上的争论反映出上层的分歧和矛盾，但毕竟不是什么政变。如果真的是在搞政变，那就会对政变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周密的筹划，针对各种可能的局面设定相应的对策；成功了自会有下一步的安排，失败了也会有有条不紊地退却，而绝对不会对事情的变化感到一头雾水，绝对不会不知所措地一味惊讶、不理解。

因此，不管林彪集团诸成员的发言本身有没有错误，他们都不过只是言者，他们没有违反党纪国法，更不是搞政变者。

第二个问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林彪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功臣集团。

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中共的创业史上是有显著功劳的。林彪是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战将，对中共军队的初创和长征的胜利建有奇勋。抗日战争初期他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是对日作战以来的第一个胜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振奋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和南下解放中南地区的战役，林彪指挥的中共军队摧枯拉朽般地解放了几乎半个中国。林彪的这些战功彪炳于中共军队的史册，且为人所共知。毫无疑问，林彪是中共创业史上一个主要的枪杆子。陈伯达则是中共另一条战线上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三十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正如已故著名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所说：“现在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新启蒙运动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开展了思想文化界的救亡民主大联合，对一代文化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大批有为青年投入中共的队伍，壮大了中共的力量。陈伯达到延安后，又发表了《三民主义概论》、《评“中国之命运”》等有影响的著作，对中共的思想理论工作建树颇多。可以说，陈伯达是中共创业史上一个主要的笔杆子。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则是林彪麾下的重要将领，在战争年代也都曾是战功卓著。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林彪集团是中共的一个功臣集团，这是他们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集团的一个根本的区别。江青集团从性质来说，可称为毛泽东的亲信集团。

一个功臣集团，一个亲信集团，这两个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文革中期中共上层的矛盾和斗争。这个矛盾和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原则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围绕九大政治报告的冲突。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这一经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公布的政治报告事件标志着两个集团在政治路线上的对立。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不过是借题外话而引发的另一场冲突而已。

须要指出的是，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里，林彪、陈伯达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一政治主张，是被作为错误的、修正主义的主张来加以论述，并加以批判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一主张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作为严肃的历史学

家，不管个人观点如何，对这件中共中央自己公布的大事，都应当如实记载。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却完全掩盖了林陈报告的主张，掩盖了这个报告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的事实，掩盖了这一冲突的政治原则性质。这种作法是很不可取的。

有人说，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参与了运动。不错，林彪、陈伯达在运动初期曾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这是无须否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形成了很高的威望，对他的决定，人们往往未经详细的考察就认为是正确的，这在广大干部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是说，有毛泽东历史威望的惯性作用。即使是彭真，在文革之初被撤职时，也曾对人说：“是我最早喊毛主席万岁的。”以表白自己不反毛泽东。可见，如果毛泽东继续用彭真，彭真也会紧跟毛泽东。二是中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相符合的。由于这种思想信仰上的局限，中共的绝大多数党员在运动初期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作为高级干部的林彪集团成员也不例外。主要基于这两点，加上林彪集团的成员在历史上曾是毛泽东的支持者，所以他们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纷争中，与周恩来一样，站在了毛泽东一边，这是不足为奇的。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虽然仅次于毛泽东，但他的影响力实际弱于周恩来，况且历史上刘少奇也并非一切正确。因此要求林彪等人在运动一开始就站在刘少奇一边是不合乎事情的逻辑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局势越来越超出想象，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难以控制，林彪集团成员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运动是国家的一场灾难，应该设法及早让运动刹车，使国家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于是，他们在1967年1月就采取了一个主动的行动，这就是军委八条的制定。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1967年1月25日，为了制止军队已经出现的混乱，“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军委八条”虽然经过了毛泽东的批准，但因它的内容是制止造反派的极端行为，它的制定过程是林彪等人主动进行的，所以被江青集团视为是一个对抗文革的事件。据董保存《庐山会议余波》转录，江青1971年1月3日在华北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还有些材料提供同志们参考，时间记不清了。八条是怎么来的？就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江青当时不便公开攻击林彪，对林彪主持制定做了回避，但她的讲话清楚表明，随着运动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在中央内部，林彪、陈伯达等人强烈反对造反派的极端做法，他们曾设法使运动刹车，以制止文革乱局的发展，这是他们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初次正面对抗。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林彪与陈伯达走到一起是因为所见略同，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勾结的关系。

所以，林彪集团对文革的认识，对江青等人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他们与江青集团的明显对立始于1967年初，九大报告稿的分歧和争论是两个集团政治对抗的一个高潮，庐山会议则是矛盾的公开化。

应当看到，中共当局彻底否定文革，是在文革结束两年之后的1978年年底。记得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出版的《朱德诗选》、《董必武诗选》、《叶剑英诗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集，都还不同程度地有一些歌颂文革的诗句。所以，严格地说，现在中共中央对文革做出的“大浩劫”的结论，是属于事后诸葛亮。因此，要求林彪集团在文革一开始就反对文革，是超越了历史条件的一种苛求。

历史地看待林彪集团在文革中的全部表现，应当承认，这个集团在文革中并非一无是处。

他们在文革中有过也有功，是功过参半。他们对江青集团的认识，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他们同江青集团的对抗，虽然失败了，但毕竟沉重打击了江青集团的力量，为该集团的最后覆亡准备了条件。

第三个问题是由第二个问题引出来的，即现在应当冷静地、客观地、全面地评价林彪集团成员的历史功过。

有人说，这个集团的成员，晚节不忠，因而过大于功。这种说法其实不对。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一个人忠不忠，主要不是看对某个领袖忠不忠，而是要看对国家忠不忠。要看他与领袖产生分歧和对立的原因是什么，看他的政治主张是有利于国计民生，还是不利于国计民生。从林彪、陈伯达与毛泽东的政治分歧看，林陈的主张是比较正确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至于他们在文革时期的过，客观地说，是在毛泽东的错误路线的作用下产生的，有些事情是不由自主的。比如，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副统帅，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的组长，这都不是他们本人所愿意的，是不由他们自主的。毛泽东借助他们的影响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对他们也并未给予真正的信任。他们的过，并没有大过毛泽东的过。

有人说，这个集团的头子林彪，晚年谋害毛泽东不成，投敌叛国，因而只能一笔勾销。这种说法也不对。林彪的儿子谋害毛泽东，并不等于林彪谋害毛泽东。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他儿子的谋害计划。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疑罪从无。退一万步说，如果林彪知道，那固然会对林彪的评价有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站在全部历史的高度，也不能单单根据晚年的某个事件，就以偏概全地做结论。

批林批孔时期，曾有不少文章以汉代的韩信来比喻林彪。这个比喻倒是有些道理的。韩信是刘邦的大将，西汉的开国功臣，功高震主，刘邦对他疑心甚大，一再整他，最后他被刘邦夫人吕后以谋反罪杀害于长乐宫。韩信谋反是否确有其事？两千多年来聚讼不已（笔者认为并无其事，此乃另一话题）。但这并没有影响史学家对韩信的历史评价。韩信仍以汉代的功臣和古代杰出军事家的形象载于史册。从对韩信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经验看，对林彪的评价应该不是难事。

总括林彪一生，1949年以前军功赫赫，1949至1966年之间，功大于过，相信也无大的争议，1966至1971年这五年，如笔者在前面所分析的，是功过参半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林彪一生的全部历史看，他与历史上的韩信相似，仍是功大于过的，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卓越的军事家。

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尽管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同林彪一样，在执行毛泽东路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某些大过（主要是按中央决定参与了一些错案，受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混淆了一些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为求局势稳定对一些参与造反的干部群众进行了压制等等），但是他们同时也与乱国之源江青集团进行过坚决的对抗，在很多方面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并曾为扭转错误路线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努力。他们在文革中同样是功过参半。总括他们一生的全部历史，他们也都是功大于过的。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皆非无过，何况是被历史大潮裹胁着漂行，又从激荡的旋涡里席卷过来的林彪集团诸成员呢？

第四个问题是林彪事件留给人们的历史教训。

现有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庐山会议之前，林彪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一些不同

意见，但是并没有同毛泽东搞对立的打算。庐山会议使两个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初时林彪也还是希望能修复这一裂痕的，曾要求同毛泽东晤谈，却未得到毛的回应。林彪的部下黄、吴、李、邱也都是盼望能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或做检查，或求晋见，也均遭冷遇。尤其是华北会议之后，陈伯达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他的“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受到大张旗鼓的批判。此事无疑给了林彪很大的刺激。连陈伯达这样侍奉毛泽东几十年的人都如此下场，自己的出路又何在？这不能不使他不寒而栗。可以说林彪最后的结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毛泽东激化矛盾、化友为敌的做法使然。

综观中国现代史，可以说，中共的创业过程是一个不断化敌为友的过程，不仅许多解放军的将领来自国民党的士兵和军官，在建国之初，连傅作义、卫立煌、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而建国后所经历的曲折，以及某些时候的动荡，则刚好相反，是一个不断化友为敌的过程，从反胡风、反右派开始，直至文革，连刘少奇、林彪、陈伯达这些同毛泽东共事几十年的战友，都一个个成了敌人。事实证明，化敌为友才是明智之举。而如果走上不断化友为敌的道路，则必然是一条自我丑化、自我拆台、离心离德之路，其结果将真的可能会导致衰败。

笔者希望中共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冷静、客观、全面地评价林彪集团的历史作用，恢复曾使中共自身获益甚多的化敌为友的传统政策。这样做，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也有利于化解中共内部的矛盾，有助于理顺林彪部下及其亲属们的情绪，这与目前中共中央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也是相符合的。

~~~~~

【文革探微】

1970年庐山会议与汪东兴

• 舒 云 •

◇ 本来九届二中全会是“神仙会”

1970年8月，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北京军区有七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候补中央委员宋双来回回忆：会前两次通知，全会的三项议程很简单。一、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8月10日）和宪法修改草案（8月15日）已印发。二、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再提交全会通过。三、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备战的文件由军委办事组起草，拟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没带秘书，他的秘书杜辛作为北京军区的秘书上的山。因为提前两天到了庐山，会议内容又不复杂，李雪峰动员大家游玩。宋双来在游玩时碰见李雪峰，感觉他很轻松，大家都很轻松。

哪里想到，“风和日丽”转眼变成“暴风骤雨”。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就很奇怪。杜辛注意到，开会时间过了好长时间，主席台上的人才到。林彪一边和毛泽东说着话，一边往主席台走。陈伯达和林彪坐一边，周恩来和康生坐另一边，坐在中间的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时毛泽东的情绪还可以。他左看看右看看，站起来，说你们谁先讲？周恩来先讲了大会议程及会议编组，几句就说完了。毛泽东又问谁讲，林彪说我讲一点意见，拿出一摞很厚的材料。毛泽东似乎不高兴地看着（瞪）了林彪一眼。林彪

越讲，毛泽东越不耐烦，中间甚至想站起来走掉，又忍耐着继续坐下。林彪通篇讲话没提设国家主席。等林彪讲完，毛泽东生气地说还有谁讲？康生说我的稿子就不念了，讲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并提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副主席当。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这时候，台下的人感觉毛泽东的脸色更加阴沉。最后毛泽东宣布散会，话还没落音，他自己就先走了。下面有些中央委员鼓掌，但北京军区的郑维山、陈先瑞、尤太忠都愣在那里。他们疑惑极了，宪法修改草案不是去掉国家主席这一章了吗？上庐山后又传达了一次不设国家主席，怎么康生又在大会上提设国家主席呢？毛泽东是不是因为这个不高兴？

8月23日晚上，华北组讨论。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河北），副组长吴德（北京）、解学恭（天津）、陈永贵（山西）、吴涛（内蒙古），郑维山（北京军区）。组员郭玉峰（中央组织部）、刘子厚（河北）、陈毅（外交部长）、邝任农（中国民航）、彭绍辉（总参）、苏静（国务院）、钱学森（国防科委）、吴忠（北京卫戍区）、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杨俊生（北京卫戍区）、尤太忠（北京军区）、刘锡昌（北京）、马福全（河北）、吕玉兰（河北）、王国藩（河北）、李顺达（山西）、聂元梓（北京）等。

8月23日晚上的讨论后，出了华北组第一号简报。因为有疑惑，所以大家发言都比较虚，没有人明确表示赞成林彪的讲话。林彪讲话的火药味很浓，为什么又不点名？其中提到“国家元首”是什么意思？多数老同志猜想是冲着“二月逆流”去的。8月24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吴德没有参加。陈毅第一个发言，陈毅大概是怕了，所以发言中屡屡表态。在陈毅发言中，有两个中央委员恶狠狠地冲着陈毅吼叫：你骨子里就一贯反毛主席，老右……郑维山小声地对陈老总说：言多必失，不要再说了。陈毅点点头，再不说了。因为“九大”陈毅受到张春桥那帮人的围攻，九届二中全会他提出来换个组，换到了华北组，他以为会逃过批斗，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坐到了正座，此时他知趣地挪到旁座。接着是钱学森不短的发言，休息后是河北的工人代表马福全发言，他还没说完，陈伯达和汪东兴就结伴来了。

◇ 陈伯达和汪东兴，谁的发言更厉害

李雪峰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讲了发言的情况后，陈伯达讲话。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大多数人听不懂，比较重要的内容汪东兴和李雪峰就帮助翻译一下。

陈伯达出口成章：毛主席是天才人物，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以后陈伯达回忆：我发言的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

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汪东兴接着发言：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都没有发言。

但华北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听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都激愤起来。更何况汪东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谁能不信呢？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政治局委员、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以后我们才知道，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原来就是毛主席本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开始还疑惑，听完汪东兴发言，说这回明确了，他也表了态。以后毛泽东说有人还说“千刀万剐”，这“千刀万剐”就是陈先瑞说的。

8月25日，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印发。各组要求设国家主席，揪人的呼声更加激烈，200多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

◇ 郑维山说，华北组是汪东兴挑起来的

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近水楼台的汪东兴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郑维山说：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第六号简报主要整理的是汪东兴的发言，因为陈伯达要单独发他的讲话，所以简报基本没用陈伯达的话。

而毛泽东相信了汪东兴，而陈伯达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如此颠倒黑白，郑维山决定挺身而出，不能让汪东兴一手遮天。8月26日晚上，郑维山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由他口述，秘书杜辛整理，主要讲汪东兴的发言在华北组的作用。郑维山的思想非常明确，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陈先瑞也这样说。信写好后，由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郑维山相信，如果毛主席看到了他写的那封信，是会原谅他的。但这封信却不知下落，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李雪峰时没有提这封信。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良恩把信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相信汪东兴的谎话，却不相信郑维山的实话。另一种是汪东兴把郑维山的信“贪污”了。因为王良恩不可能直接把信交给毛泽东，只能由汪东兴转。汪东兴看过郑维山信中的内容，当然不能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郑维山怀疑汪东兴扣了他的信不是没有道理。

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北京的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他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预备到北京时要见郑维山，汪东兴不敢不打电话通知。杜辛是早上8点接的电话，此时他们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检查战备。以前汪东兴打电话，都很客气，毕竟彼此没有过节儿，而这次很不耐烦，晚饭前能不能赶回来？杜辛说我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汪东兴说回不来就算了。放下电话，杜辛先给陈先瑞的秘书打了电话，问清楚是毛主席下午5点在丰台车站专线停车处接见。杜辛报告郑维山，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没有机场，可以派个直升机，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可以赶回北京。郑维山马上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我可以赶回来。汪东兴还是不耐烦，说赶不回来就算了，安全重要，不要勉强。明显不想让郑维山见毛主席，而郑维山也没有坚持。以后郑维山很后悔，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毛泽东，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因为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寸步不离，李雪峰不好当面揭发汪东兴。而郑维山是军人出身，直筒子，他才不管汪东兴会不会给他穿小鞋呢，他肯定要当面向毛泽东讲清楚华北组会议的情况。郑维山哪里知道，他会因庐山会议被抓起来。

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认为：即使毛泽东看过郑维山揭发汪东兴的信，他仍会倒陈保汪。因为倒陈早有准备，只不过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至于对郑维山，毛泽东也早就不放心了，1968年打倒杨余傅时毛泽东就动过连郑维山一起拿掉的念头。后来周恩来说了话，陈伯达也附和，毛泽东才放弃的（见《陈伯达遗稿》第100页注3）。陈晓农说：1969年底到1970年初，毛泽东将27军调到石家庄，把63军换走，不是偶然的。“九大”时毛泽东特别问过王洪文当兵在哪个军，王洪文说是27军的，在军部呆过。所以，好多事情从表面看似偶然，搞误会了，若对照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就会感到不完全是误会，是历史的必然。

纪登奎曾把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叫到办公室，专门问到郑维山在庐山上的表现，还问写过什么东西？杜辛说过战备报告。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杜辛说你指是什么？我不可能记起来。纪登奎沉默一会儿，说你的感情要转过来。杜辛说我的感情怎么转？我给郑维山当秘书是组织上派的，经过我的事情我知道，不经过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不欢而散。中秋节前，把杜辛从内蒙古押回北京军区，关在86楼。郑维山罪行材料组的魏科长要他交代郑维山反38军，以及与陈伯达的关系，又问到郑维山的这封信。杜辛说魏科长，你也当过秘书，秘书有秘书的规定，中央委员给毛主席写信，合乎组织纪律，更何况我也记不清写的是什么了。你们要查到中

央去查。那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还没有去世。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责问，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

◇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这样回忆：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经过汪东兴这样的误导，毛泽东认为汪东兴上了陈伯达的当。

其实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这种串连活动汪东兴早就开始做了。8月21日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会作、李作鹏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

8月25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正因为汪东兴的发言，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郑维山认为他和陈伯达、李雪峰是工作关系，没有阴谋，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也成了陈伯达一伙。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毛泽东认为四、五号简报还没有出，为什么华北组抢先出第六号简报？这中间有阴谋。毛泽东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这种定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掀起了一场大斗争，揪出了所谓“陈伯达反党集团”。

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军委办公厅的王振和杜辛整理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但他是作为河北省的秘书参加的大会会务组。简报快整理好时，林彪指示各大军区搞战备材料，杜辛被叫走了。王振那天有什么事，所以简报主要是黄道霞整的。在华北会议上，黄道霞讲清楚了简报编写的过程，证明不是反革命简报。以后李雪峰、郑维山以及华北组简报都被平了反，陈伯达反革命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人。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cnd.org/](http://www.cnd.org/)
